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By Edward J. M. Rhoad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x, 394 pp.**

近年來關於清末新政的研究層出不窮，如《清末新政史》、《清末憲政史》、《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及《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等等，與其相關的論文亦有二百來篇。這些著作和論文將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國的政治變革及政治勢力的變遷面貌逐步具體化，在對新政的性質、歷史作用、歷史地位及憲政改革的評價上花費了大量筆墨，但敘述的角度仍多循「改革——立憲運動——清朝假立憲——武昌起義」這樣一個思路，不同之處僅體現在對改革的不同評價上，讀來多有相同之感。而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此著的與眾不同之處，則體現於其觀察此段歷史的角度之中。作者注意到今人觀察晚清歷史時思維上容易受到建國後民族劃分的影響而將「滿族」視為一固定的歷史主體並以此展開研究的弊病。他提醒我們，在清朝的大部分時間裏，「滿人」更多的是與八旗制度聯繫起來被視為一個職業群體，而並非僅僅是一個種族群體。梁啟超在1898年關於滿漢關係的文章中，開始將「滿」作為一個種族群體來看待，認為滿漢之間的關係如同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種族衝突」。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敘述為推翻清廷的統治提供了學理上的論述基礎，也影響了後來人們對滿人、滿漢關係的理解。

本書共有「導言」、「隔離與不平等」、「慈禧與『特殊制度』」、「載灃與『滿人權勢』」、「1911年革命」、「辛亥革命後的清廷與滿人」及「結語」七個部分。全書以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創辦《清議報》，呼籲「平滿漢之界」為起源，結合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的糾纏與角力展開論述，詳盡分析了慈禧與載灃欲將權力重新集中到清皇室的努力嘗試及其失敗的原因。在最後一章，作者比較了袁世凱、日本侵略者及中國共產黨在對待「滿人」這一群體的政策之歧異，以對昨日之「滿人」如何在清廷退位後逐步被各種政治勢力改造及構建成今日之「滿族」的精簡分析作為全書的結束。

在第一章中，作者指出八旗制度從根源上來講是一個多種族的組織，不僅有蒙古八旗、漢軍，而且在滿洲八旗中也有新舊「滿洲人」、朝鮮人、藏人甚至俄羅斯人。但在外界看來，八旗是以一個整體出現的，他們共享一個地位，一個共同的認同；而非八旗的人群則為「民」——他們後來被作為一

個與「滿」相對的概念：「漢」。在第二及第三章中，作者討論了慈禧及載灃改革的目的及措施。他指出恩銘的被刺對清廷是個很大的震動，這一事件使得清廷開始認真考慮滿漢問題，而慈禧亦從此開始對八旗制度進行修正，許多改革措施比「百日維新」的時候還要深入。但作者亦認為，這些政治及軍事改革缺乏計劃而且相當冒險，在改革的過程中，滿漢高層官員的待遇差別逐步增大。載灃以改革者的姿態開始其攝政，但不久之後他開始厭惡改革甚至與潮流進行對抗。在他的攝政下，清廷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集中地由滿族操縱。儘管載灃遵循了慈禧晚年關於改革滿漢的決定，但在實際操作上並無太大進展，在某些方面載灃的措施較之慈禧甚至是一種倒退，如他在法令制定上給予了宗室、王公大族以往所沒有的種種特權。而在皇朝憲政改革上，載灃僅僅推行了慈禧九年計劃中的第一項，在其他三項中並無太多建樹，並且因為其政策的前後矛盾、反復無常被其政敵攻擊為「優柔寡斷」。在對武昌起義的分析中，作者認為清朝的迅速崩潰並不意味其無能力對起義作出軍事及政治的反應，只是清廷對改革太遲做出決定以致倒臺。

「辛亥革命後的清廷與滿人」一章則着重討論了辛亥革命後清廷的地位及北京各政權對「清室優待條約」的遵守。儘管清廷的尊貴位置一直到馮玉祥將溥儀趕出故宮前尚能得到保持，但普通旗人的生活相當窘迫。由於受革命黨早期宣傳的影響而遭社會的歧視，他們開始組織自己的聯合會，「旗人／民人」的對立逐步轉化成爲「滿／漢」的對立。作者指出，從「滿人」名稱的改變可以看出這一群體在社會以及歷史情境（context）中的輕重：有清一代，滿人的認同不可避免地與八旗系統的歷史及結構交織在一起；到清末民初之際，定義誰是「滿人」背後則牽涉到定義誰是「漢人」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劃分下，「滿族」最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儘管其組成成分已經與八旗制度下的「滿人」群體有了相當明顯的分別。

縱觀全書，最爲精彩的莫過於作者對慈禧與載灃“recentralize”和“reimperialize”努力的分析（按照筆者的理解，“recentralize”是中央政府試圖將地方過大的權力重新收歸中央，而“reimperialize”則是清廷的皇族宗室希望進一步將權力收歸手中；不難看出，後者帶有強烈的滿族親貴專權的色彩）。路康樂指出，慈禧晚年的改革已經帶有上述兩個特點，而到了載灃攝政時期，“reimperialize”的色彩更爲強烈，其目標不是爲政府而是爲清廷重新聚集權力。而“reimperialize”的嘗試並非始於載灃，在1861年奕訢被任命進入軍機處時已經開始。因爲軍機處在設立當初就沒有安排親貴任職的傳統，而載灃任命奕劻等親貴爲政府各部門首腦時則打破了以往不許親貴擔任這些要職的

禁令，這些舉動都為後來「皇族內閣」的出臺鋪平道路。而清除滿漢畛域，是改革者關注的另一問題，但清廷在這一對策上的躊躇和矛盾以及對皇族權力的不斷加強，導致了主張改革的精英們與清廷最後的分道揚鑣，也導致了清朝新政的失敗和整個政權的崩潰。

近年來，清朝的族群意識與族群關係成為國外學者考察清朝歷史的一個重要切入點，主要著作如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的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歐立德（Mark C. Elliott）的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等等。柯嬌燕一書主要「分析乾隆時期（1736-1795），清王朝如何透過身份的界定，來統治多元文化組成的大清帝國。」【見張瑞威對該書的書評，載《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卷，第1期（2003），頁173-176。】而歐立德在其著作中則運用族群理論來解釋滿族歷史和八旗制度。本書與以上兩部著作相比，最大特色在於很少空洞地探討理論的問題，而是通過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序列中勾勒出人物與群體的活動，進而根據史實建構相關的理論框架。該書相距作者的上一部著作整整25年，無論是其書對清末民初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之間關係的討論，還是作者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都值得我們再三思索。

吳昱

中山大學歷史系

**葉麗婭，《典妻史》，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2，5，2，129頁。**

葉麗婭的《典妻史》堪稱第一本從民俗學層面對「典妻」這一古老風俗進行梳理的著作。此書討論的時段從古代一直綿延到現代，所用的資料又有不少是作者直接從民間收集、調查得來的，自出版以來，已經引起了有關學者的注意，如陳勤建先生就曾在《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發表書評〈另類婚俗的歷史鈎沈——葉麗婭《典妻史》的人文圖像〉，對它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筆者近期對浙東一帶的典妻風俗亦有所關注，讀下來自有一番特別的感覺。

首先應該肯定作者所花的功夫是值得贊許的。書中的資料出自正史、歷代筆記、地方誌、民國時期的各種習慣調查報告以及歷代小說、戲曲等多種來源，筆者覺得尤為難得的是作者幾次親自下鄉收集到的一些民俗資料，這